

大学中庸

皇家
读本

张居正讲评
《大学·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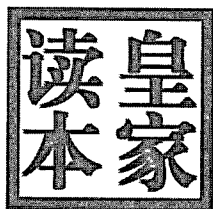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评

《大学·中庸》

陈生玺译解



样一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陈生玺等编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26-2086-9

I. 张... II. 陈... III. ①儒家②大学·中庸—通俗读物 IV. B22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570 号

策 划 张晓敏
责任编辑 陈翔燕
装帧设计 姜 明

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出版人 张晓敏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70 1/16 印张 10 字数 150 000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978-7-5326-2086-9/B·89

定价: 19.8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5032807

序

熊召政

上海辞书出版社将要出版张居正讲评“四书”系列之《张居正讲评〈论语〉》这本书，我听后稍感诧异。因为在我对张居正的研究中，无论是他自己的书信奏疏，还是《明通鉴》、《三编发明》这样的史书，均不见对此书的记载。询问编辑，告之乃据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海内孤本，心下更为称奇。即请求编辑将书稿寄来一阅。读其讲评章句，乃张居正语气无疑，典型的蒙童读本。这个蒙童不是别人，正是明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翊钧。

一

朱翊钧于1572年即皇帝位，时年十岁，起用他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三十八岁时，就曾担任过嘉靖皇帝儿子裕王的老师。这个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堉。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朱载堉嗣登大位，于当年就拔擢张居正为内阁辅臣。张居正时年四十二岁。两年后，朱载堉又安排张居正担任太子朱翊钧的讲师。就这样，张居正成为隆庆、万历父子两位皇帝的老师。

张居正四十八岁主政内阁。用他自己的话说，彼时“主少国疑”，张居正同时担负起主政与帝师的双重责任。

关于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振衰起隳的历史功绩，史家多有定评。我在这里仅就张居正帝王师的身份作一点评述。

明代的帝王师分为两种：一种是皇帝经筵的讲臣，多从翰林院中的词臣挑选；还有就是东宫的讲师，负责太子学习的专门机构即詹事府。大凡太子登基，都会拔擢自己的老师到内阁担任辅臣。明代的首辅中，不少人都是太子老师出身，因此，当太子的老师比当皇帝的老师，似乎政治前程更大。

张居正是在隆庆、万历两位皇帝登基之前，担任他们的讲臣，所以，他先后得到父子两位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所不同的是，他只是隆庆皇帝的讲臣之一。当时隆庆皇帝有五位老师，分别是高拱、李春芳、赵贞吉、殷士瞻与张居正，主讲官是高拱。所以，隆庆皇帝登基之后，这五个人都相继入阁，但隆庆皇帝最为倚重的还是高拱，故让高拱当了首辅。

万历皇帝为太子时，只有四岁。他六岁出阁读书，张居正成了他的主讲官，这为张居正日后出掌内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能够当上帝王师是一种难得的荣耀。古人有言：“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这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但真正能实现这一理想的读书人却少之又少。明代选择帝王师，虽然有非常苛刻的条件，但已当上帝王师的，从其作为来看，大部分都很平庸，极为恶劣或出类拔萃的，都比较少。究其原因，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帝王师的条件制订有误。帝王师首要的条件是学问渊博，其次是品行端正，单从字面上看，这两条绝对正确。若要认真探讨，就会发现，在明朝，所谓学问渊博，就是对孔孟的儒家学说，做足寻章摘句、阐微辨意的功夫。若培养学者，此类学问尚无不可，但培养君王，用这一套，便觉隔靴搔痒。二是在读书人看来，帝王师高不可攀，但他除了“师”的身份，还有一个“臣”的身份。皇帝虽然是学生，但更重要的是“师”的主子，老师跪着进讲，而学生却坐着听。单从这一点来看，所谓帝王师，也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仆人而已。因此，老师进讲时，大都战战兢兢，除了按当年洪武皇帝钦定的孔孟之道来讲述，自己哪敢将经邦济世的学问掺杂进去呢？

二

作为首辅，张居正是成功的。李贽誉他为“宰相之杰”，一点也不过分。作为帝师，张居正也是称职的。

隆庆皇帝于1572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晏驾。半个月后，即六月十日万历皇帝登基。六天后，高拱的首辅被两宫皇太后罢免，张居正接任。八月六日，刚把祭祀大社、大稷的典礼举行完毕，张居正就以揭帖进奏“请以是月中旬，择日御文华殿讲读”。同时向小皇上建议：每

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接见大臣讨论国是，其余的日子则到文华殿参加日讲。他并亲自为小皇帝选择了马自强、许国、申时行、于慎行、余有丁等六位讲臣（这六人后来都先后入阁成为辅臣）。

当年的十二月下旬，张居正又向小皇上进献《帝鉴图说》。这本书是以连环画的形式，精选八十一则可以仿效的历代帝王治国之善举、三十六则引以为戒的祸国之恶行，讲述兴衰存亡的道理，每则故事配图画一幅。张居正主编这本书，可谓用心之深。在进疏中，他言道：

前史所载兴亡治乱之迹，如出一辙。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无不治者。

此时的皇帝才十岁，张居正不让他死啃孔孟，而是让他熟悉历代帝王之得失。可见，从一开始，张居正就铁定想培养一代明主而非培养一位秀才。窃以为，非有大忧患者，不会有这种大功德的举措。

《明通鉴》中，关于张居正如何作帝师的记载，有如下几则：

万历元年二月癸丑（初二）上御经筵，从张居正所请也。

一日，讲毕，上问：“建文帝果出亡否？”居正曰：“国史不载，但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太息，命录诗进。居正曰：“此亡国事，不足观也，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云。

三月，丙申，诏举将才。

时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籍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乃是诏内外官各举其人以备任使。

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万历元年，神宗皇帝当时只有十岁。前则故事道出小皇帝的好奇心，想打听建文帝的下落。张居正及时阻止他的企图，因为他毕竟是高祖朱棣的十一世孙，正是他的祖先，当年发动“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叔侄争权虽是家事，但皇位从此落到朱棣这一脉系，毕竟来路有些不正。这件事在民间一直存有非议，许多人对建文帝抱有同情。朱翊钧少不省事，才打探这件事情。张居正若附和或者怂恿小皇帝为建文帝正名，势必会

在朝野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轻者摇撼政局，重则动摇国是，因此张居正才有以上一番言语。尽管当时就有人对张居正没有借此机会为建文帝表白幽怨隐恨表示不满，但从稳定政局角度考虑，张居正采取的方法无可指责。

后一则故事更是表明张居正以史为鉴，向小皇帝灌输“富国强兵”的思想。让小皇帝由古及今，认清当朝“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的弊政，并由此作出推举将才的决定。张居正通过讲授，让小皇帝得到熟悉政事掌控大局的方略。这种方法，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事实证明，张居正的教导卓有成效。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一，天空出现日全食。在古代，大凡出现灾异，君王便认为是上天示警，便要立即检讨自己的过错。因此，就在这一天，小皇帝为对天象表示敬畏，在宫中制作了一块牙牌，上面写了十二件事：“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

当小皇帝将这一块牙牌拿给张居正看时，张居正非常高兴，趁机教导说：“此数事者，虽因天变自警，其实修身治天下之道理全在于此。皇上可终身奉行。”接着又说：“懂得这些道理并不困难，但要身体力行就不那么容易。从今以后，皇上所作所为，凡有与所写不一致之处，应允许左右执牌以谏。”

此时，十三岁的皇帝朱翊钧，与其说是一个好皇帝，还不如说是一个好学生。他对张居正十分尊崇，冬天经筵，他亲送银炉给师相暖手，夏天调制羹汤给师相品尝。张居正主政内阁十年，朱翊钧从未喊过他的名字，总是客客气气地称“元辅张先生”。此等殊荣，当朝大臣均羡慕不已。

朱翊钧长大后，张居正对他的严格教育也未停止。万历九年二月，张居正组织一帮儒臣编写的《列朝宝训》、《实录》成书，再次呈给皇上。

两书共分四十类：即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侠，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却贡献，慎赏赉，敦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寇盗。

从这四十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这部《列朝宝训》讲的仍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帝鉴图说》是童蒙读本，而这部书则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学了。此时朱翊钧已年届十九，且已结婚三年，属于成年人了。张居正为他制订了更为庞大的学习计划。遗憾的是，此时的朱翊钧，已失却少年的纯真。他的祖父世宗皇帝的贪婪与刻薄，父亲穆宗皇帝的沉湎酒色等恶劣品质，已在他身上逐渐露出端倪。

三

从张居正讲评“四书”的用语来看，这部讲稿当与《帝鉴图说》同属一个时间段，都是讲给少年朱翊钧听的。

关于张居正的学问根基，一般都推为法家，但他对孔孟的儒家学说，的确也有自己的发明与创意。他不主张死读四书五经，而积极引导小皇帝参悟经书背后的内容，契合孔子发言时的心境与语境。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给湖广提督学道金学曾写过一封信。摘录如下：

夫以孔子之圣，平生所志，惟在东周，生今反古，深用为戒。老不得行其道，犹修《春秋》以存周典，此岂以周之法独善于前代哉？盖为天下之礼宜尔也。今世俗皆称“愿学孔子”，乃不务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过。而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誉。此岂圣人所谓“为下不倍”哉，恶在其遵孔氏也！

不穀素无学术，谬膺重任，思所以鼓驾钝，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犹未二、三也。窃以为今之教士，与士之为学，皆如不穀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后有得于遵也之义，不识高明以为如何？

这封信的大致意思是，学孔若仅拘泥于字句，则非遵孔，而是抑孔、损孔。西哲有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袭其意用之，则一切学问皆是当世的学问。张居正特别强调“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复古学风。

给金学曾写信不久，张居正又给南京国子监司业屠平石写了一封信，对如何治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行之，故与七十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

在这里，张居正进一步肯定孔子因地献策、因材施教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研讨学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入仕为官之前，此时学习就以“修己治人”为主。入官之后，其研修学问则应以“称职免咎”为主了。前为励志，后为致用。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与七十门徒探求学问，坐而论道，是因为他周游列国而谋不到经邦济世的差事。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治学观崇尚务实而厌恶空谈。经他爬梳的孔孟儒学，立足于“用”而非稽古钩沉。

总而言之，作为帝师，张居正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于历史的典籍中发掘治国的文化资源。客观地讲，他是一个好老师，但从朱翊钧日后单独柄政的行迹来看，则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好学生。

四

在中国历史中，帝师与皇帝，既是师生，又是君臣。有时候，帝师很好皇帝却平庸。有时候，皇帝渴慕知识而帝师不能传授经邦济世的韬略。像诸葛亮之于刘备，魏徵之于李世民，刘伯温之于朱元璋，都属于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如云从龙，如风从虎。

设想一下，如果让张居正碰上刘邦，或让他碰上李世民，那将是一种何等辉煌的历史气象！但是，历史不接受任何假设。他所有的“富民强兵”的智慧与呕心沥血的栽培，只换回一个以勤勉开始以昏庸告终的皇帝。数百年之后，仍让人扼腕叹息。

2006年12月20日下午写毕

绪言

陈生玺

一、《大学》

《大学》乃《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乃汉宣帝时五经博士戴圣从先秦遗留的典籍中编撰而成，说为春秋时曾子所撰，曾子（前 505—前 435），名参，鲁国人，他和父亲曾点同是孔子的学生，曾亲聆孔子的教言。此书乃发挥孔子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宏阔纲领，主要内容有三纲、八目。什么叫“大学”，据汉代郑玄（127—209）的解释：“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大学就是广博的学习。宋代朱熹则解释说：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仪，十五岁入大学，以公卿大夫贵族子弟与庶民之俊秀者为主，学习进德修业治人的大道理，所以“大学者乃大人之学也。”总之，大学属于成人性的教育，以修养品德和将来治人从政为目的。

《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根本道理，在于彰明人自身的光明德性，使之除旧布新而成为新人，以达到完美至善的境地。这就是大学的三纲。儒家认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纯洁而光明的德性，即明德，由于后天受社会习染而产生各种不良的欲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认识恢复自身的这种德性，革除一切不良的污染，而成为新人，从思想品德和行为上达到最完美至善的境地。怎样才能达到“明明德”、“在新民”、“止于至善”呢？有八项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项条目中则以修身为中心。他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说，要彰明自身的光明德性，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先整齐自己的家庭，要整齐自己的家庭，必先修养自身

的品德,要修养自身的品德,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志,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必先意念真诚,要意念真诚,必先有明确的认识,认识明确在于明达事物的道理。他接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达事物的道理之后认识就明确了,认识明确后意念就真诚了,意念真诚后心志就端正了。心志端正后就能修养好自身的品德,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后,就能整齐自己的家庭,家庭整齐后就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国家治理好以后才能平定天下。从天子直到平民百姓,都要以修养自身的品德作为根本。只有完成这八项步骤才能达到完美至善的境地。这里的国家是指诸侯封国,天下指周王朝所统御下包括各诸侯的全中国。

在八目中,他特别强调诚意,认为一个人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关键在于诚意。所谓诚意就是要意念真诚,没有虚假,就必须“慎独”,“慎独”,就是谨慎地对待自己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和行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说的诚意,就是说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污秽的臭气,如同喜好美好颜色,这都是出于自己的本心而毫无愧疚,所以君子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他举例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那些无德的小人一个人独处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但见了君子都要躲躲闪闪,掩盖自己的不善而故意表露出自己的善,实际这是没有用的,别人看你如同看到了你的心肝,是掩盖不了的。“诚于中,形于外”,内心真诚与否必然要显露于外,所以君子独处时一定要谨慎。“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曾子说,一个人在独处时,也有十只眼睛盯着你,十手指着你,多么严酷啊!这就告诉人们,在任何时候,即使自己一个人独处时,也要真诚,不要欺骗自己,若有不善之念,要及时反省克服,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而隐瞒。先不自欺,然后才能不欺人,不自欺比不欺人更难。

在修身这一节目中特别指出了人性的弱点,人对自己所亲爱的人只知其善而不知其恶,对自己厌恶的人只知其恶而不知其善,这叫做辟。只有克服了这种辟,才能齐家。他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

人之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要整齐自己的家庭在于修养自己的品德者，是因为人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多有所偏爱，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多有所偏恨。因此对喜欢的人知道他的坏处，对厌恶的人知道他的好处，这种情况太少了，所以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都不满足自己田里禾苗的壮实。这就是不修养好自身就不能整齐自己家庭的原因。这里的家，不仅指人们的家庭也包括卿大夫的采地食邑。

把家治理好了，就会给人民提供一个好的表率 and 示范作用，“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个家庭实行仁爱，一国也会跟着兴起仁爱，一家实行谦让，一国也会跟着兴起谦让，君主一个人贪婪残暴，一个国家就会产生混乱。他举例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尧舜用仁爱率领天下，人民也就跟着实行仁爱；桀纣用凶暴号令天下，人民也就跟着兴起凶暴，他的命令和他自身的行为相反，人们是不会服从的。因此君子只有先自己做到了，再要求别人，自己不先做，才能禁止别人。所以只有把身修好了，把家整齐了，才能治国平天下。要达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实行絜矩之道。絜是衡量，矩是方形的尺子。絜矩之道就是以自身为尺度去衡量别人，用这一道理去治理国家。对此他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就是说在上位的统治者尊敬老人，就会在民众中兴起孝道；在上位的人尊敬长上，在民众中就会兴起悌道；在上位的人抚恤孤寡，民众就不会背叛。这就是君子实行絜矩之道的作用。你厌恶在上者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下面，你厌恶在下者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上面，你厌恶前边人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后面，等等。总之要推己以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儒家的德治思想，他们认为有了德，能团结人民，也就有了土地，有了财物，有了财物，就可以供人使用。“有德此有人，有人有此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就是儒家所主张治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道理。

二、《中庸》

《中庸》传为孔子的孙子战国时子思所撰，子思（前483—前402），名伋，鲁国人，曾为鲁缪公师。《中庸》一书的基本思想是讲中和，反对“过”和“不及”。所谓过就是超过，不及就是没有达到，过与不及的标准就是中，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不可改易。所以中庸就是平常而不可改易的中正和谐的道理。

《中庸》开宗明义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上天赋予人的就是性，遵循这种性行事就是道，按照这种道进行修养就是教，教包括教育和教化。这乃是全书的纲领。《中庸》的作者和《大学》相同，都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中庸》全书阐明人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善良本性，遵循这种本性的天道而进行自我修养。他认为人有喜怒哀乐，人的本性即表现在喜怒哀乐之中。他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发生的时候叫做中，发生出来合乎节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人们达到中和，天地就会各在其位，万物就会成长发育。这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时，心情处于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它包含着人的本性，发生之后要合乎人们认同的常规常理，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和。人类社会和外在世界只有在这种和的状态中才能很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他认为中庸是一种很高的道德，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已经很少有人能实行了，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理，但是老百姓已经很久不能做到了。为什么，他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焉；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是因为聪明的人行为往往超过，愚笨的人则不及。中庸之道不能彰明的原因，是因为贤能的人认为自己高明，不值得学习，愚笨无能的人则不知道应该学习，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庸之道对人的切身意义，好比人人都要吃饭，但很少有人能够品尝出其中的味道。

中庸学说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忠恕思想，他说：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做到忠恕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别人施加给自己不愿意的事情，自己也不要施加于别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卫灵公》）。中庸主张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但过和不及在各个时代，会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而有不同的标准，其中也包含着差异和不同。怎样的思想和行动才算合乎中庸之道？通过子路问强，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子路问怎样才算强？孔子回答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还是北方人的强？还是你认为的强？用宽和的精神感化人，对于横行霸道的人不进行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强，君子乐于这种强。用兵器作为卧席，战斗死而不悔，这是北方人的强，特强的人乐于这种强。君子与人和睦而不随波逐流，坚持中庸而不偏倚，这是多么坚强啊！政治清明不改往时的志向，政治黑暗至死不改变平时的操守，多么坚强啊！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南方人的强，“不报无道”是不及，北方人的强，“死而不厌”是超过，只有“和而不流”，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动摇，才是真正中庸之道，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折中主义。

中庸强调的是人治思想，“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是说贤人在位，好的政令就能实行，贤人没有了，政事也就消亡了。人道的法则是勤于政事，地道的法则是培育树木的成长，政事好比芦苇，只要你用力，很快就会成长起来。所以为政在于得人，而得人在于修身，而修身在于遵循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就是从仁做起。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就是爱人，以亲爱亲族为最大；义就是相宜，以尊重贤人为最大，将仁义推广而言，就是如何对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通称五达道，五种通行天下的道理，即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人人应各守其道。要实现这五达道，必须有三达德，通行于天下的三种道德：知、仁、勇，他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

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道努力学习，就接近智了，尽力去实行就接近仁了，知道耻辱就接近勇了，知道这三者，就知道怎样修身，知道怎样修身就知道怎样治理人群以至治理国家天下了。这里智、仁、勇虽是强调修身，然而在今天来看，它强调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包括道德、知识和能力。

中庸之道又强调它的普遍性，所谓“费而隐”，效用广大而道理却很隐微，大而无所不在，小而隐微不显，存在于日常各种事物之中，所以人要体认中庸之道，必须从心灵的深处回复自己的天性，然后从此出发，修己治人。

一是“慎独”。这和《大学》所讲相同，但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之道是人片刻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那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君子在自己还没有看到时也要谨慎警戒，在自己还没有听见时也要恐慌畏惧，因为人心从没有比在幽暗中最为明显，没有比在细微时最为显著，因此君子在独处时应该谨慎。这是要人们在思想的源头上，在一个人独处意念发生时，就要怀着恐慌畏惧的心理，警惕自己以防一念不善的产生。因为在这个时候，意念之善与不善，自己是最清楚的。这就是儒家修身条目中特有的自律观念。

其次是“诚”。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实在而没有虚假。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地万物自身生存的道理，达到诚是人应该遵循的道理。赋予诚以精神的意义，是在强调诚的重要性。人应该真诚，人如何达到真诚呢？他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要达到真诚，必须选择善事而坚持固守，广博地学习，仔细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晰地辨别，认真地实行。学习要坚持到底，以学会为止，问以问明白为止，思考以得到要领为止。“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一次就会，自己就用百次；别人用十次，自己就用一千次。只要能够按照这种办法，即使愚昧的人也会变得聪明，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人的学习作用，人通过学习也能达到诚。

诚的作用在于能“尽性”。所谓“尽性”，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本

性。只有最真诚的人,才能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发挥自己的本性,也就能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发挥众人的本性,也就能发挥事物的本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能发挥事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万物,人可以处在与天地并列的地位。这是说人通过发挥自己的本性,认识外在世界,按照外在世界的本性去参与治理外在世界的活动。

诚不但是“成己”,关键是还能“成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成己就是使自己道德完善,是仁;成物就是从自己出发而推己及人而成就他人和外物,是智。仁智合在一起,以此来治理国家天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天下只有最高道德和最大智慧的人,才能治理。所以它要求“君子尊德行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们要尊崇自己的天然本性,必须经过学习询问,要达到广大的境地,又必须详尽到精微之处,要达到极高明的地步,必须实行中庸之道。这乃是全书的总结,他强调人要达到中庸之道,必须进行修养,修养的方法就是在尊崇天然本性的基础上学习并且认真地去实行。

目 录

序

绪言

大学 1

 大学 3

中庸 53

 中庸上 55

 中庸下 92